

## ■新作聚焦

## 薛媛媛长篇报告文学《中国橡胶的红色记忆》

## 记录一代人的奋斗历程

□木弓

薛媛媛的长篇报告文学《中国橡胶的红色记忆》讲述了上世纪新中国建设的艰苦年代,几万湖南青年男女响应国家号召移民云南边境,为国家种植宝贵战略物资——橡胶的感人故事。这个普普通通的中国人民的故事在历史长河中流淌了半个世纪,才由一个对湖南充满情感的作家发现并报告给我们。虽然晚了一些,但这些湖南农民的事迹仍然深深地打动了我们;这些遥远的故事还是那样悲壮、那样有力量、那样让人敬畏。

新中国建立初期,为了掌握中华民族自己的命运、突破帝国主义封锁、保护国家安全,中共中央在毛主席的倡议下,决定在云南边疆地区开辟橡胶种植区。由于边境地区少数民族人口太少,无法提供劳动力,中央决定由湖南省出人、出力,支援边疆,完成国家的战略任务。就这样,一大批优秀的湖南儿女离开了自己的鱼米之乡,进入荒无人烟的原始丛林,开始了另一种人生。几十年过去了,中国已经成为橡胶大国,进入了世界大国的行列,而那些曾经为了共和国的明天扎根边疆、艰苦奋斗的湖南儿女怎么样了呢?他们现在好吗?他们已经退出了人们关注的视野,差不多就要被忘记了。边疆的那片片橡胶林还在流着乳白色的胶汁,而第一代创业者却都老了,有不少人都已经长眠在他乡的森林山岗中了。那些火热青春的故事也许就随着这些生命的去老而烟消云散了。

然而,他们那些微弱的信息传递到薛媛媛耳朵里却成了一种强音,撞击着作家的心灵,激发起她写作的冲动和灵感。她敏感地感受到,湖南人民为新中国建设作出的伟大贡献必须重新融入我们的历史记忆之中,湖南人民那种伟大的献身精神必须成为共和国的文化财富传承下去。她开

始了一个艰苦的旅程——深入边疆橡胶林场,寻找当年的湖南支边青年,进行大量的材料收集和采访调研。作者多次深入生活、充实材料、提炼主题。通过每一个支边者的记忆和诉说,聆听着伟大历史的动人回声。于是,一部题为《中国橡胶的红色记忆》的报告文学主题在作家的胸中酝酿成熟了。

在这部作者呕心沥血的作品里,作家写出了当年湖南儿女的时代热情和独有的精气神。他们都是普通的农民,他们的思想感情都很质朴,也许并不能深刻认识和理解国家的战略部署,但他们一听说是毛主席的决定,马上就激发起巨大的情感。凭着对伟大领袖的感情和热爱,他们最终做出了自己人生的选择——就因为“是毛主席的家乡人,不能给毛主席丢脸”这股精气神,他们走上了一条为国家无私奉献的道路。作家写出了湖南人性格中的豪迈之气和道德精神。就因为对祖国的一句承诺,这些单纯的湖南人最终在原始森林扎下了根,在极为艰难的条件下开垦出一片土地,种上了橡胶树。又经过多次的失败,他们终于种活了橡胶,经过几十年的奋斗与坚守,建设出国家重要的战略资源基地。作家写出了湖南人坚强的品质和英雄的气概。经历了时代的风风雨雨,这些为我们时代作出伟大牺牲的湖南人仍然无怨无悔,从容生活。他们的第二代、第三代中仍然有不少人继承了先辈的事业,继续在边疆奉献,成为地地道道的边疆人。他们是普通人民,却有着英雄般的胸怀和情操。在这部作品里,他们成为了作家笔下大写的人。当然,在现实生活中,他们也是大写的人。

《中国橡胶的红色记忆》坚持以人民群众为表现主体,书写人民的历史,热情赞美

了人民群众的伟大创造精神。中国人民经过长期的奋斗,创造和积累了巨大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最终使我们的国家走向世界,成为有重要影响、负责任的大国,推动着世界格局的变化,为人类的文明进步作出了应有的贡献。伟大的“中国梦”就是在广大人民群众一点一滴的牺牲和奉献中建构起来,并成为现实的。人民群众的力量是实现“中国梦”的根本保证,任何时候都要铭记人民群众的丰功伟绩。《中国橡胶的红色记忆》通过对湖南人民的历史贡献的描写,表现出作家正确的历史观。正是作家坚持人民创造历史的观点,才能真实表现湖南人民的精神风貌,还原历史真实的面貌。这个“红色记忆”,正是“中国梦”的血脉,有了这个血脉,就会有中华民族的梦想。

作为一部报告文学作品,《中国橡胶的红色记忆》将一群普通人的命运与一个时代、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命运联系起来,努力通过一个个有血有肉的人物塑造出一大批生动感人的报告文学人物形象,组成了身上带有浓重湖南文化特色的边疆橡胶种植场工人的群像。作品采访的人物众多,通过记录每个人的青春记忆和曲折经历,汇成了作品独特的内容。这个群体的形象就在这段叙述中逐渐清晰起来、鲜明起来、鲜活起来。湖南人血脉中独有的个性品质也因此提炼出来,构成了湖南文化性格的基础,进而使我们感受到中国人民性格的魅力。

近年来,承受着世界格局的变化,中国的大国地位越来越突出,面向世界争取话语权的力度也越来越大。中国的报告文学作家敏感地发现了这种历史性变化,提出以探索“国家叙述”的方式来更正确、更准确地描写现实。这个提法虽然朴实,

但内涵很有信息量,也很有实践性。同时,这个概念中至少有一个信息将很快形成思想共识——我们的文学将会寻求摆脱过去穷困、弱国的叙述心态,以一种更有底气和更有精气神的话语方式表现我们这个时代。今天的现实世界,从而表现“中国梦”,这是中国文学令人振奋的思想艺术进步。《中国橡胶的红色记忆》显然得到了时代文化精神的生气灌注。虽然写的是弱国、穷国时代的故事,但在叙述观念上颇有“国家叙述”的意味。作品所着力描写的湖南人性格形象中也传递出了时代的信息。

《中国橡胶的红色记忆》不仅在思想上具有厚重感,在艺术表现上也颇具特色。作者在严格遵守报告文学真实性的条件下,以一个小说家特有的把握语言描写的方式来对待报告文学的写作,使这部作品在叙述语言上渗透着很强的文学性。我们通常会指责报告文学缺少文学性,但这部作品恰恰突出了报告文学的文学性。薛媛媛是一位优秀的小说家,受过比较严格的小说语言表达训练,对文学语言的表达得心应手。进入报告文学创作后,她自觉地把这种文学融入讲述中,增加了语言的魅力,也使主题表达更具张力。同时,作者在描写人物时特别注重细节的展开,这也是小说家天生的本事。作品中大量的细节描写,不仅抓住了人物的个性特征和心理状态,也深化了氛围的营造,有效支持了主题的展开。这部作品的优良艺术品质,正是从作家的这些表达特色中呈现出来的。

《中国橡胶的红色记忆》是一部大写人民精神的英雄史诗,也是一部讴歌伟大“中国梦”的力作。我们这个时代,需要作家多写出这样的优秀作品。

## ■创作谈

我的朋友问我:“你怎么突然跑到云南去采访?”

我怎么突然跑到云南去采访?这一切缘起于我去电信局排队交话费。那天排在我前面的两位女士谈起:清明节,有1000多人从云南结伴回醴陵祭祖,他们是50年前响应毛主席号召去云南种植橡胶的支边老人。当两位女士提到谈虎色变的毒品王国“金三角”和“缅甸打仗”时,我的头脑突然敏捷起来,虽然令人敬慕的湖南支边和令人生畏的金三角与我平时的写作遥远得如同星月,可偏偏这时,我被这几个词语击中了。当了多年作家,我突然发现自己的写作一直处于一个狭小的空间中,从未有勇气走出去。

然而,这幕尘封已久的支边壮举是半个世纪以前的事,故事又发生在云南,于我非常陌生,去写这段历史不知前景如何,我的头脑一片混沌。于是,我开始上网查资料:“20世纪50年代,中国橡胶还处于依赖国外的无胶国。没有橡胶,飞机上不了天,汽车跑不动,国民经济建设和民用生活陷入困境。美国及西方盟国断言:中国是种植橡胶的禁区,中国科学家却在‘禁区’试种橡胶成功”。我跑到醴陵李华棠老人家了解当年背景,他告诉我:“当年中央决定迁徙一大批人去云南种植橡胶,毛主席把这一历史重任交给家乡湖南人。于是,一声令下,数万湖南人来到这荒无人烟、猛兽出没、瘴气成灾、国民党残军偷袭的险峻之地,历经种种艰难困苦和生死存亡,把一个无胶国变为世界产胶大国。”随着李老的述说,我混沌多日的头脑顿时打开。

我揣着盘缠,背上行囊,沿着澜沧江、伊洛瓦底江、红河4000多公里的边境线,开始对湖南支边人进行采访。半个多世纪过去,他们中有三分之二人长眠云南,健在的三分之一也是七八十岁的老翁。“未觉池塘春草梦,阶前梧叶已秋声”,我面对的是垂暮老人回忆50多年前的历史。老人的回忆有时让我感动得泪流满面,有时又悲壮得让我彻夜难眠。我感觉我不是在采访,而是在和他们重新经历一次苦难的开荒植胶的历史。采访中我听得最多的一句话是:“我们是来自毛主席家乡的人,我们没有给湖南人丢脸,种出了世界一流的橡胶。”这句话像风一样在岁月的旷野深处大声呼号,每听一次,我的心就怦然动一次。在当年,这是一股强大的力量,是这股力量支撑着他们走过了半个多世纪。在3次下云南、前后7个多月的采访中,有时从一个农场转到另一个农场,沿山走七八个小时的车,不通车的地方就徒步走来。那段时间我跑坏了3双跑鞋,双脚长满血泡。我想我有这样的勇气和毅力完全是被湖南人在异乡的奉献和牺牲精神感动了。

我是个小说作家,这些年不断有长篇、中篇、短篇作品问世,惟独没有长篇报告文学。我先是抱着写一部长篇小说的目的去云南采访,然而,当我头脑里呈现出一个个真实感人的故事和穿过北纬22度创造了世界第一的橡胶林时,我就想真实地表现这段历史,惟有报告文学能载动这段真实的历史,于是,就有了我的第一部长篇报告文学。

□薛媛媛

## 一个作家的感动

## ■书讯

## 苏北《植点青绿在心田》:期待人心变得柔软

苏北的最新散文集《植点青绿在心田:苏北海外散文71篇》近日由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出版。散文集收入《一场有关钱的对话》《春》《童年的吃食》《养老婆》《游黄山小记》等作品共71篇,约19万字,均是作者在港澳台地区发表过的作品。

苏北著有小说集《蚊民》、散文集《那年秋夜》以及回忆性著述《一汪情深:回忆汪曾祺先生》《忆·读汪曾祺》。他的作品“其文淡雅,有本土的文化气息,接近于中国古典散文的传统”,“文字心存善意,悲天悯人,温暖和煦,冲淡平和”,在诸多只见大、不见“我”的散文作品中独具一格。苏北新作以“植点青绿在心田”入题,意在提醒读者在物质逐渐丰富、生活水平逐渐提高的今天,应该保持自己内心的柔软、敏感、善良。

## 颜浩《民国元年》:讲述大时代中的个体遭际

陕西人民出版社策划出版的《可以触摸的民国》系列丛书近日推出新作,颜浩的《民国元年:历史与文学中的日常生活》。作者用文学的语言构建了一个独特的历史空间,以生动的历史细节表现了社会转型期人们日常生活与价值观念的改变以及大时代中的个体遭遇与命运。

《可以触摸的民国》系列丛书分为现场、侧影、细节、新学4个子系列,致力于向民国时代致敬,与读者分享民国文化的温暖与感动。颜浩的《民国元年:历史与文学中的日常生活》一书将文学引入历史叙述,细腻地展现了“民国元年”这个历史切片中的民间日常生活——改朝换代的困惑、乱世飘零的艰辛、新旧道德的碰撞、岁月沧桑的感慨。让我们跟随作者的文字回到“现场”,回到那一个个有血有肉的普通人间,去体会他们的忧惧、喜悦与悲伤。

本报讯(记者 余义林) 长篇报告文学《吴斌:中国最美司机》首发式近日在杭州举行。这同时也是杭州市纪念毛泽东同志“向雷锋同志学习”题词发表50周年的大型活动之一。浙江省省协党组书记赵和平,杭州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翁卫军,以及社会各界人士250余人参加活动。

《吴斌:中国最美司机》由浙江作家孙侃撰写,全书计20余万字,由人民交通出版社出版。作品以昂扬的激情和美妙的笔触,再现了被誉为杭州“最美司机”的吴斌在突遭意外时用生命最后76秒勇救乘客的感人事迹。作者敏锐捕捉到“平民英雄”这个社会热点话题,经过详细的追踪和采访,以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主题,叙述了吴斌的成长经历和爱岗敬业的可贵精神,探讨了当代英雄的重要意义和价值,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对先进人物的敬佩之情。

首发式上,与会者对作品所蕴含的深刻思想内涵和创作特色进行深入分析,并结合当下现实畅谈爱岗敬业精神的重要性。首发式结束后,还举行了现场签名赠书活动。

黄孝阳的《旅人书》是一部独特而智慧的小说,阅读的过程是新奇、困惑、惊奇、深思多种审美感觉交织的过程。在文学面孔趋于模糊的当下文学世界中,《旅人书》无疑是一部具有鲜明个性和独特标识的小说文本。

小说提供了由70座城构成的“文学部落”,这些“文学部落”所具有的异彩、灵性、繁复使众“城”组成了一方别具风味的“文学地理”。这些林林总总的古城与乡邦区别于现实中我们置身的城市,充满原始与危险、神秘与诱惑,令读者既爱又怕、既向往又想告别——我宁愿将它视为黄孝阳的精神“鸟有之乡”。如何构筑这个文学地理?如何处理这个文学地理中的时空?借助于这个文学空间,作者要表达怎样的意味和思考?这些关乎小说的形式与内容,也是我在阅读过程中所关注的问题。

大略说来,《旅人书》是一部历史与现实的寓言,以长篇小说的体式承载了阅读的理趣、思想的光芒、文化的象征和现实的症候。在形式上采取了类似于《哈扎尔词典》的词典体式,逐个演绎旅人游历的70座“城”的故事,而“62个故事”是抽去了古远历史背景的现实故事或是去历史化的文化寓言。在体例上,主体部分的旅人书和作为后续或补充的“62个故事”看似有别,但从内容上来看,两部分都是以故事的方式讲述人的生存困境和历史机理与真相,62个故事是现实版与世俗版的旅人故事,旅人故事是历史版与幻想版的62个故事。两个部分互为隐喻,最终成为一个有机整体。

旅人遍访城邦的叙事视角让我们想到类似于《格列佛游记》《巨人传》那样的叙事传统,以旅人踏访古城作为核心情节,这些形形色色的远古城邦、村落乡邦,既是旅人的真实之“城”,也是黄孝阳在文学世界中苦苦寻觅的精神之乡。离城、月城、哭城、为城、枯城……这些充满原乡意味的城邦,构成了虚构的文学家园。而其中深刻的语义库和文化库,则包含了历史寓言、现实预言、危世预言的多重意味。

## 黄晓阳与解玺璋对谈“权力与爱情”

本报讯 3月16日,作家黄晓阳携打磨6年的新作《爱情万岁》来到清华大学,与评论家解玺璋共同亮相清华大学时代论坛,以精彩的对谈同高校学子们分享了一场主题为“权力与爱情”的悦读会。此次活动由重庆出版集团和中国移动手机悦读基地共同主办。

黄晓阳曾以《二号首长》等官场小说为人所知。而在新作《爱情万岁》中,作者却一改题材,讲述了一段绝美的爱情故事。作者运用微观的笔法,

读者从《旅人书》中看到了斑斓的色彩,看到了死亡与新生的蜕变,看到了林林总总的“好玩”的东西。然而,“读故事的人”可能总有点骨鲠在喉的难受,很多叙事内层无法在快速阅读中被看穿。于是,我逐渐觉得黄孝阳的《旅人书》是一部“反懂”的书,不是每个故事都能读懂——正如小说里所说的“不是所有的谜都有谜底”。作家未必会把《旅人书》中的每个故事讲透,某些故事想要表达的某种“意味”可能就是故事所要抵达的意义。从这个意义上说,《旅人书》大概不是写给普通读者的书。

在我看来,《旅人书》最为深邃、最让我惊心动魄的地方在于,小说显示了作家重新定义世界和经由小说设置的历史遗存与种种情境,进而回到历史原点、勘察世界多样性、历史可能性和人的选择性,试图呈现出这种丰富性和驳杂性的努力和野心。说得具体一点,《旅人书》的特色在于摆脱了日常经验下的历史与现实理解,重构了70座旅行之“城”,在这个“城”里小说展现了多维、多方向的可能性,对生存可能性、对历史多样性、对人与族群多种选择性的探究与思考成为小说的最终目标。日常经验成为不可靠的解读视角,日常经验与现实主义文学理论的种种成为理解《旅人书》的障碍和阻隔。

《旅人书》所涉及的小说元素甚多,但所侧重的小说元素我以为是“故事”,这个故事并非传统意义上由头有尾、有开端、高潮和结局的故事,而是表情、达意、说理的一种媒介。《旅人书》是关于旅人和旅程的故事,关于旅人在旅途中遭遇世界、寻找意义的故事。从“故事”的角度看,传统小说与现代小说的区别并非在于其中的故事性,故事恰恰是二者共通的地方;

它们的区别在于如何讲述和呈现故事,即呈现故事的方式和形态。

传统意义上与人物、情节并重的所谓“故事”,或者说纯粹意义上的“故事”在《旅人书》中并不多。完整的故事呈现并不是《旅人书》的目的,70座城和62个故事并不都具有传统故事的机理与完整性。《旅人书》讲述故事的方式无疑是现代意义上的,书中涉及到很多经典的童话、寓言、神话故事的讲述——这种讲述属于对经典的重构或改写。《声城》是对“美人鱼”童话的改写;城里最漂亮的美人鱼贝拉长大后想要去寻找童话《海的女儿》里一样的王子,她历经千难来到了人类和城市中间,“脸颊如同初生婴儿一样娇嫩的女子”满足了她的愿望,帮她实现了寻找王子的理想。贝拉觉得很快活、很满足,对老鸨姐姐感谢不尽。那么,这个被改写后的童话“内核”是什么?简言之,单纯和无知常会导向悲剧和灾难以及灾难中的不自知。《声城》是对人类欺骗、虚伪、无耻的控诉,也是对理想主义及理想者的提醒。理想者和理想主义被某些口号蛊惑、被某种政权利用而导致的悲剧在近现代尤其是当代历史中已有无数先例,以理想的崇高和实现理想的激越来怂恿理想者是阴谋者惯用的伎俩,就像老鸨姐姐“善意”地安排贝拉在青楼卖身一样。

《旅人书》是一部外形和内核都饱满,技巧和精神兼具的小说。故事的内核是小说的生命与灵魂,好的小说都有一个故事的内核。《旅人书》的内核和主题是多元而丰富的:家园的失落、寻找以及重建家园秩序是《旅人书》很重要的一个内核。《旅人书》中的“人类”是“宇宙的瘟疫”,人是“罪之子”。正是这种荒原感催生了旅人的“旅行”行动和对意义的“寻找”。

在《旅人书》中,黄孝阳以批判的立场走进颓败的历史,介入当下纷乱的现实,在历史与现实的诸多病象中诊断出共同的基因缺失和文化贫血。“旅人”出入于各式“城”时所目睹和遭遇的各种思考和困境,也是我们民族甚至世界民族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化形态和发展困境。

国家大剧院院长陈平介绍说,“歌剧兴趣

## 首都150所学校成为国家大剧院“歌剧兴趣培养基地”

本报讯 3月16日,北京市第二中学、和平街第一中学、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等中小学校被授予国家大剧院“歌剧兴趣培养基地”的牌匾。这表示此项工程经过一年多实践,已由最初北京市3个区的10余所中小学拓展至目前5个区的150所学校。同时,大剧院还联手北京工商大学共创了北京市首个大学校园基地。

国家大剧院院长陈平介绍说,“歌剧兴趣

## 中国文著协向教辅侵权说“不”

本报讯 “3·15”前夕,中国文字著作权协会向广大作家群体发出公开信,启动向教辅侵权单位的维权行动,接受作家委托,帮助监测文字作品被教辅非法收录的情况,并采取相应的维权行动。

近年来,众多教辅图书选用文字作品未经作家授权且未付酬的侵权现象比较猖獗。文著协负责人表示,根据《著作权法》的规定,教

辅图书选文应该遵循“先授权后使用”的基本原则,否则,即构成对入选作品权利人著作权的侵犯,出版单位应当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权利是法律赋予的,但是权利的实现和行使,需要广大作家自己一起争取。目前,多位作家对教辅侵权工作都积极响应。另外,为方便受理广大作家对教辅侵权的投诉,文著协专门设立了维权热线和维权邮箱。(著文)